一五一十周刊

NO.124

2013年9月20日

郭忠华：西方政党与民主：在共生和悖论的结构中 | 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及其恶果

郑东阳：马英九和王金平九月政争——苏联式政党的政治遗产

和党在一起：

多党制中的党派政治



编者的话

2013 年 9 月 8 日被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形容为“台湾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立法院长王金平受控干预司法、败坏民主制度，面临被国民党考纪会开除出党的处分，进而丧失立委和院长资格。

素来温和的马英九冲天一怒，引来各方猜疑：绕开司法而以党纪惩办立法院长，是否符合程序？王金平和民进党若即若离的关系，是否导致了他的困境？在多党制之下，党派政治与民主制度、多元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张力？本期一五一十周刊不仅试图描绘马王之争的来龙去脉，也带您一探党派政治如何适应日益多元的社会环境。

马英九的批评者们注意到，他和王金平虽为“同党”，却在诸多议题上意见相左。而马在王出国参加女儿婚礼之时发难，也有失厚道。诸多细节，有赖龙谨汐的梳理。在理清事实的基础上，郑东阳提醒大家，国民党是苏联栽培过的党派，其“以党治国”的基因，既不能容忍王金平与民进党保持良性关系，又引导马英九以党规操作对立法院长的指控。至于马英九是否能用党规驾驭全党，杨平不以为然。民主转型之后，赢得选举已经成为国民党精英的头等大事。与其和党魁保持绝对一致，不如向选民抛橄榄枝。

在政治理论层面，党派政治和民主大有南辕北辙之处。郭忠华和刘军宁的论述表明，党内的民主和党外的民主几乎相辅相成。松散的政党是没有战斗力的，而过分严密的组织势必导致官僚化和暗箱操作，进而加深党派和民众的隔阂。尤其是开除党籍的手段，简直无视结社自由这一基本民主权利。

放眼欧美，党派政治正在追赶多元的现代社会。袁超看到，党派归属远非决定美国议员举动的唯一标准，而且美国党派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和高高在上的党魁。徐贲则提醒大家，只受党性支配的政党政治还应是美国继续提防的风险。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党的影响力则不复当年的风采。弗农·波格丹诺发现，民众越来越适应不依附任何党派的政治生活，这使得政党内部的管理丧失活力。

在中国大陆，党派政治和日益多元的社会也亟需调和。郑永年相信西方制度可以保证政府在种种分歧中运行，而中国则不然：一旦意识形态层次的分歧波及高层，就会与社会分化所产生的极端情绪绞在一起，从而引发政府议程瘫痪，甚至权力斗争。

告别城邦时代之后，庞大的人口不再允许人人直接参与政治。客观条件要求政党继续代表民众。但如何为多元的社会提供有效服务，同时逃离以党谋政的窠臼，需要当今世界的政党深思。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将本刊分享至：         



【观】

8-1 龙谨汐：马英九“快刀痛斩”王金平引争议

> **马英九一直重炮轰王金平身为“立法院长”却涉入司法关说，违背宪法，是台湾民主政治、民主司法发展史上最大的耻辱。但吊诡的是，马英九扳倒王金平的手法也被批为违反宪政体制。**

震撼台湾政坛的台“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关说案在9月11日迎关键节点，王金平被撤销国民党籍，意味着王丧失“立法委员”身份和“立法院长”之职几成定局。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关于此案向国民党考纪会进行陈述，讲到激动处数度哽咽，称自己内心十分沉痛，为此还彻夜难眠。

马英九“快刀痛斩”王金平颇有挥泪斩马谡的意味，但马英九此次出手之快、力度之猛、手段之狠亦出乎众多人的意外，也引发持续的强烈争议。

王金平“关说案”的来龙去脉

此“关说案”可谓台湾政坛大地震，从9月6号台湾特侦组引爆“政治核弹”至11日王金平被撤国民党籍，才5天时间。

6日台特侦组公告王金平等人涉嫌为民进党“立委”柯建铭关说（说情），指示检查官在柯所涉的一案件被判无罪后，不要上诉，让柯建铭无罪定谳。

由于王金平6日前往马来西亚一离岛参加女儿婚礼，直到10晚才返回台湾。在外出期间，交通和通讯不便，王金平方面的声音鲜见，几乎是马英九在全面开火。8日马英九亲上火线，拉上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吴敦义和“行政院长”江宜桦召开记者会，痛斥关说案是“台湾是侵犯司法独立最严重的一件事，也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



10日晚，王金平终于返回台湾，在机场他发表六点声明，对特侦组的指控矢口否认，并反斥特侦组侵犯秘密通讯自由、对“立法院”无行政监督权。

11日，按照国民党计划将在9点半召开考核纪律委员会决定是否对王金平作出处分，但在此之前，即早上8点半马英九还特意召开记者会，再次表明坚定的立场。

马英九在该记者会上说，王金平涉入司法“关说”案，他比谁都感到痛心不舍，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别无选择，必须挺身而出。身为党主席，只有明确表达态度，王已经不适任，如果考纪会不能作出撤销党籍以上的处分，解除王不分区“立委”的资格，让王离开“立法院”，那国民党等于是默许司法尊严被继续践踏……铁一般的事实放在眼前，不管我再痛心、再不忍、也不管我与王院长有多深厚的公谊私交，英九不能坐视国民党的议会议长，如此赤裸裸地介入司法？英九岂能眼睁睁的看着国民党这个百年政党，因为执政党籍的“立法院长”关说司法而蒙受不可承受的莫大的羞辱？

马英九还强调，今天是台湾民主法治关键的时刻，相信党内同志会站在历史大是大非的这一边，一起为捍卫司法公信力而努力，一起为捍卫国民党的党誉而努力。他还说，各位同胞，这是关键的历史的时刻，全（台）人民要对司法干预勇敢拒绝、大声说不，这才能树立一个典范：就是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以把手伸进司法，这样以后的政治人物才知所警惕，全世界也才看得到台湾为了捍卫民主法治所展现的决心。

此后的考纪会经过2个多小时的讨论，决定撤销王金平党籍。国民党连夜发布的撤销王金平党籍的公告指出，“立法院长”王金平同志涉及关说司法案件，斲伤司法公信力，严重损害本党的形象与声誉，违反本党纪律，经中央委员会考和纪律委员会议决议，予以王金平同志撤销党籍处分。

11日中午，王金平确认自己遭国民党开除党籍后，下午便委任律师提出确认党籍存在的民事诉讼，并提出假处分，要求在判决确定前，阻止国民党将党权丧失证明书送交台湾选务机构，得以让他行使党员权利，以保留党籍、保卫“立委”身份，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之中。但据分析，即使是王胜诉，也几乎无望保卫“立委”资格。

从此次关说案的发展脉络看，从引爆到撤销王金平党籍，前后历时才五天。虽特侦组也涉嫌非法调查，但在事实上，从公布的几段录音来看，王金平可能难逃关说之为。马英九也多次表示，王金平不认罪的态度让他感到失望，完全不能接受。他指责，王把炮口对着特侦组的调查程序，但对王自己涉入司法关说却绝口不提，对这些明确的事证避而不谈。

然而除了此案是否关说的认定之外，该案引发的后续效应并未结束，马英九“快刀痛斩”王金平还引发其他重大争议。

马英九或违背宪政体制 破坏权力分立制衡

马英九一直重炮轰王金平身为“立法院长”却涉入司法关说，违背宪法，是台湾民主政治、民主司法发展史上最大的耻辱。但吊诡的是，马英九扳倒王金平的手法也被批为违反宪政体制。

民进党认为，马英九利用司法和行政，连手打压立法，违反民主宪政体制。马英九破坏宪政秩序，践踏民主法治，滥用“总统”权限！这正是马英九过去几天所正在伤害台湾的行为！真正可悲的是，位居“总统”高位的马英九已成为台湾民主宪政最大的乱源！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长子连胜文指出，“觉得他（王金平）违反法律，那就应该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正当的法律程序。我很不能理解，为何要在人家嫁女儿的时候做这种事？”

马英九在 8 日的记者会是以“总统”的名誉召开，当时还拉上了吴敦义和江宜桦，但是在 11 日的记者会却以国民党主席省份召开，之后也是通过国民党党内处分的方式撤销王金平党籍，让其丧失“立法委员”和“立法院长”身份。

可见，前后两次记者会马英九所用的身份不一致，这也点出此次快斩王金平的最大争议。为何不前后一致，如果王金平违反司法为何不通过司法解决，未审先判，提前定调，通过党内处分方式？为何“总统”代表的行政权却能以党内渠道扳倒立法权的执掌者“立法院长”，这符合宪政体制中权力分立、制衡的原则吗？如果长此以往，岂不说明握有“立法院”多数席位的党魁可以操控“立法院长”，党魁能直接制衡立法权？

另外，台湾特侦组通过监听的方式，获得此次关说案信息，最后成为控告王金平等人的证据呈现，也仍存争议。尽管马英九方面多次强调不是非法监听，有法可依。但是特侦组违反程序争议的司法原则也确切无疑。

有台湾媒体指出，纵放特侦组用滥权监听方式取得王金平的对话内容，更让“检察总长”跳过正常程序，进入官邸内跟他（马英九）咬耳朵（私下报告），最后在当事人尚未申诉情况下，透过国民党考纪会对王开铡，尽管能用法条和诡辩，自我安慰这一切符合程序，实际上，却毁了他（马）多年标榜的宪政体制与司法独立。

马王之争的是为了民主宪政、司法正义还是政治斗争？

是次关说案爆发至今，虽然马英九一直声称是为了维护台湾的宪政、司法、民主、正义，但诸多台湾媒体，甚至众多国际知名媒体皆把此案径指政治斗争。

有台湾媒体认为是马英九主动而公开地斗王金平。马对王已长期不满，最近王金平嫁女儿，婚礼定在 9 月 8 日，王已向马请假，从 6 日请到 10 日，婚礼的地点是马来西亚一个



华侨在离岛开设的度假酒店。王已于9月6日清晨出发。而马就在王启程当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对王展开奇袭，宣称王涉及司法关说案，王嫁女儿办喜事，马却选在这个时候宣称要办人，王在交通电讯都不方便的马来西亚离岛，根本无法及时响应。由此可见这次马斗王，乃是完全不对等的斗争。

台湾知名评论家南方朔指出，台湾媒体界普遍认为，马的目的是要以关说为名，取消王的立法院长甚至立委资格，如此马才可能安排亲信出任立法院长，掌控立法院，俾让核四和服贸协议等重大案件能在立法院通过。因此，这宗关说案，乃是马的亲信势力要在台湾司法检察界和立法院扩张的开始。

他还指出，目前台湾政治已到了真正的巨变时刻，马英九为了贯彻他的意志，他要将手伸进立法院，硬将引起重大争议的核四及服贸协议通过，而于此同时，则是国民党的内斗及朝野互斗也将尖锐化，到底马英九会赢吗？

亦有观点指出，马王心结由来已久，历经十余年，从台湾朝野到社会民间几近尽人皆知，从2005年两人国民党主席争霸战之后，两人因不同行事风格、政治个性、人脉关系而导致的心结与冲突，开始浮上台面。在国民党重掌执政权后，两人更经常在法案及“立法院”运作上意见相左，近来包括核四公投、服贸协议、年金改革等法案迟迟无法进展，使两人关系更加恶化。因此，马英九这次对王金平迅雷不及掩耳地说重话、下重手，即使理由再充分，手段再完备，必然会被视为政治斗争，更何况在野党必然会抓住马王心结与宿怨大做文章。

由此可见，尽管马英九的措辞之中饱含对台湾宪政、民主、司法公正的维护、爱惜之情，但他的做法、选择很难逃脱政治斗争的嫌疑，这也是台湾舆论乃至众多民众难以理解、接受的原因之一。

从此“关说案”看台湾的民主

根据台湾TVBS民调中心最新调查结果，撤销“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党籍，有过半数，55%的民众不赞成，就连国民党认同者中，不赞成的比例也高达47%，中立选民更高，有6成表示不赞成。此次被台湾媒体喻为是“九月政争”也冲击马英九的满意度，从8月底的13%，再创新低，滑落两个百分点，来到11%，不满意的比例，高达68%。

此外，有关此次“关说”是否真“关说”，是否真的如马英九所述的严重？特侦组将监听内容直接向“总统”报告，是否存在违法泄密的问题？马英九对此案出手是否过重、过狠？王金平因此下台对于“立法院”的运转是否更有利？此案对台湾的民主、司法、正义等是利大还是弊大？台湾的宪政体制是否不完善、存在漏洞等问题都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台湾民众对本案的反应来看，再次揭示一奇怪的矛盾——为何马英九声称的为了台湾前途、未来的正确之举却反而常常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是马英九最聪慧还是台湾民众太笨，抑或是马英九太笨？

2012 年《经济学人》杂志曾称马英九为“笨蛋”（Ma the bumbler），当时台湾方面还言辞抗议。这次关说案美联社则用“行政笨拙”（Administrative bungling）来说马英九，可见马英九常常被认为聪慧的反面。马英九执政以来，满意度屡创新低也是一个体现，一个充满改革精神、廉洁、勤奋、道德高尚的执政者为何满意度如此之低，最近只有 11%？

针对此次马王战，李敖认为，王金平这件关说案并没有什么，王金平只是帮柯建铭一个忙过关，一来一往的交际让“立法院”运作更正常，“所以马英九不适合搞政治”，政治是需要这样的交际。他说，政党协商本身是违反“立法院”纪律，违反民主政治，政党协商是王金平说了算，而这帮了马英九、国民党很多忙。

李敖还笑说，马英九“用一张好脸蛋骗了台湾 47%的妇女票”，其实心狠手辣。他认为，马英九的能力就这么多，“拔王”并非上策，而王金平在国民党势力有 47 席，他建议王金平搞党团罢免马英九，“不要浪费时间，把他赶走”。

由此可见，民主有纠错功能，可以在一定时期之后重新选择执政者，但是在重新选择之前的期间民众通常不得不“忍受”被选的执政者。而且民主只是多数决，不是选择人人都喜欢的人选，且被选的执政者不一定会最终被多数选民喜欢，可能其意志正好与多数民众相反，不能代表多数选民的意见。作为执政者应该执行自己的意志还是多数民众赞成的意志？虽然执政者认为正确的意志可能有利于长远，但如果长久得不到选民的支持，他也不能长久坐在执政台上。

民主到底要选择怎样的执政者更合宜？可能台湾现今的民主经验是可供讨论的极佳例证。

（本文原载于共识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2 郑东阳：马英九和王金平九月政争——苏联式政党的政治遗产


郑东阳：专栏作者，曾供职于凤凰周刊等媒体，历任记者、主任记者、编委。

很多人认为，王金平作为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并且高居“国会议长”，却经常充当“和事老”，不仅给民进党人留下好印象，还深深伤害了马英九政府。在正常的民主社会，“国会议长”难道不就是扮演各政党议员的统筹者和争议调解者？这种“以党领政”的传统思维已经成为国民党人的“政治是否正确”的标准。

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入关说，引爆国民党政治风暴。王金平否认关说，强调自己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国民党考纪会11日上午做出处分决定，王金平被撤销党籍。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党员若遭受撤销党籍处分，经过一年以上，可以申请恢复党籍，意即王金平最快一年后，即可申请恢复国民党党籍。

所谓“关说”的意思介于打招呼、说服之间。台湾人民超有文化，很多词大陆已经不用了。“关说”出自《史记.佞幸列传序》，“公卿皆因关说”，用言辞打通“关节”。也就是说，国民党认为王金平为了民进党立委召集人涉及到的案件，向法务部部长打招呼，此举干涉了“司法公正”。

根据《台湾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公职人员之关系人不得向机关有关人员关说、请托或以其他不当方法，图其本人或公职人员之利益。本法第八条定有明文。其中所称关说、请托，指其内容涉及机关业务具体事项之决定或执行，且因该事项之决定或执行致有不当影响特定权利义务之虞者。

事态下一步会怎样？

台北地方法院11日下午证实，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已经委托律师邱太三，派人到法院递状提出“假处分”诉求，要求国民党将撤销党籍的处分暂缓送至台湾“中选会”，另外也同步提出“确认党籍”民事诉讼。



王金平如果依循前台湾“立委”许舒博模式提起上诉，在没有确定处分前，就可保留不分区“立委”资格，而且胜算很高。

许舒博曾因涉及中药案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不分区“立委”身份差点丧失，最后却以1000万元新台币取得“假处分”裁定书，国民党被法院要求不得在审判定案前注销许舒博的“立委”资格。

在许舒博成功告赢国民党再度夺回党籍身份后，国民党已修改党章，明订“申诉期间，不影响考纪会决议执行，”也就是所谓的“许舒博条款”。在该党章的规范下，国民党员如不服党内处分，就算向法院声请“假处分”，也无法在申诉期间阻止国民党将决议送交台湾“中选会”。

因此，台湾媒体分析，如果国民党在做成撤销王金平党籍身份决议后，立即将决议送达台湾“中选会”，王金平将立即丧失“立委”资格，亦即将一并丧失立法机构负责人一职；届时，就算王金平再声请假处分，亦无任何实益；因为法院不可能有办法在一天之内完成收案、分案、开庭等作业程序。

苏式政党的政治遗产

有关马英九与王金平的心结，不得不提及2005年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2005年，国民党完成了历史性的首次差额直选党主席，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成为新党魁。他用选票击败了党内最具政治实力的王金平——当年，王金平已经连任三届“立法院”院长。

过去百余年，这个自诩为“亚洲第一个民主政党”的权力交接从来都是“钦定”接班人，公众提前多年就能目睹接班人的成长。党的改革甚至远比地区民主化进程还要慢。

彼时，刚完成大陆“世纪之旅”的连战宣布不参选，但连爷爷没有表明自己属意的接班人是谁。当连战走到投票所投票时，他希望能留下这个历史镜头，彰显自己的让贤之举，因此在投票时多停留了几秒钟，配合媒体拍摄。但也因此，电视媒体事后通过技术手段证实，连战将票投给了王金平。

连战的决定，代表的正是党内大佬的真实想法。若不是马英九人气旺盛、实为党内最有希望在2008年胜选的人物，论资排辈远远轮不到他。1954年，江丙坤从政时，马英九才5岁；吴伯雄1973年担任桃园县县长时，马英九刚从台大法律系毕业。没有地方人马和党内派系支持的马英九，无疑是第一个从党内民主中受益的主席。



2008 年以后，马英九开启了国民党深化改革之旅，包括党产的处理、地方派系的整合。中常会选举透明公开化，并且在有贿选疑云时，立即宣布改选。但显然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且马英九的能力和他身边的学者政客们往往因为魄力和能力受到各种质疑。

2012 年年初大选时，国民党曾经营造出极为团结的场面，几乎每个场合，马英九和其现任及未来的副手萧万长、吴敦义等纷纷上台演讲，连战、吴伯雄、王金平等党内重量级大佬纷纷站台，试图对外说明国民党无比团结，大佬们没有因为马英九启动的改革而与之产生心结。

但是这些大佬们的表现，显得毫无新意。在吴伯雄到场时，前排所有人均起立迎候，唯独萧万长岿然不动。直到连战到场，较连战更晚当上“副总统”的“微笑老萧”才赶紧站起来，频频致意。

这种特殊的文化，让国民党看起来极为不像民主社会的选举型政党，苏联式政党的文化展露无遗。比如在两岸交流过程中，国共平台是最主要的途径，因此国民党党内的各个大佬极为重视自己的职位，以便于在两岸交流中获得自己的地位。比如国民党十八大时，为了调整各方利益，设置了八个副主席，被台湾媒体调侃为方便与大陆九常委交流。

在这次马英九与王金平的政治风波中，很多人认为，王金平作为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并且高居“国会议长”，却经常充当“和事老”，一些举动不仅给民进党人留下好印象，而且还深深伤害了马英九政府，比如一些法案，国民党籍立委明明在“立法院”占据多数，通过却很艰难。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国会议长”难道不就是扮演各政党议员的统筹者和争议调解者？“国会”难道不应该严格审理政府的每一项法案和决议？这种“以党领政”的传统思维已经成为国民党人的“政治是否正确”的标准。

台湾的政治制度与这种思维有很大的关系，国民党人在解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受到党内保守派（当年马英九也属于保守派，他反对“总统”直接选举）的影响。当年，改革派认为，直选符合民意，而且美国式“总统制”正成为所有新兴国家效仿的对象。保守派则坚持孙中山的“五权体制”，认为国民大会不能废除，过去的“总统、内阁混合制”可以有效制衡权力。最后的政治制度的确立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为了满足“以党领政”、延缓执政生命的需求，孙中山的五院制度被保留，“总统”也被允许直选。因此台现行“宪政体制”既不是“总统制”，也非“内阁制”，被称为接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总统”、“行政院”以及“立法院”三者之间的也常因权责不清而导致政局纷乱，王金平与马英九的冲突也与此有关。（壹读-台湾边角料有删节）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3 杨平：台湾国民党转型的经验与教训


杨平：《文化纵横》杂志社长、总编。

“ 在威权时期，国民党通过提名地方政治精英参选党议员，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但是，随着民主政治转型，国民党党产资源的萎缩、党机器的弱化，使得党不再拥有权威和能力提名议员，同时也不能以政治资源的给予来换取他们对党的忠诚。”

台湾实行民主转型已20多年，自外部观察，台湾稳定的两党竞争格局已经形成，民主转型之初的参与混乱已经过去，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感日益明显，一个新生的公民社会也已经出现。但以长时段观察，台湾转型之后的弊端也十分明显，诸如媒体乱象、蓝绿恶斗、族群撕裂迄今并无改变。更为糟糕的是，民主政治导致行政效能下降、重大决策难以达成共识，经济发展绩效不彰，已从20年前位于亚洲四小龙之首，退居四小龙之末。

观察台湾的政治转型，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是政党转型。国民党从一个执政的威权型政党，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逐步向议会型民主政党转变，其间的遭遇和调适，以及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台湾民主政治成熟与否的重要参考点。与此同时，国民党从一个执掌政权及全部党政军经济资源的政党，经历2000年丢失政权，并于2008年重新夺回政权，这中间的政党调适、组织再造、职能变迁，对于面临政治体制改革压力的大陆而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2012年5月底，笔者带着上述问题造访了台湾国民党中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曾经担任国民党面对政党轮替前后的党内重要角色，亲身经历了台湾政治和政党的转型。其中包括曾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的李建荣，历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新闻局长”的程建人，历任国民党基隆市、台北市党部主委的郝龙斌、台北市长竞选总部总干事的潘家森，历任台北市副市长、文化局长的国民党新生代政治家李永萍，曾在民进党担任要职后因陈水扁贪腐事件转而投向国民党、对两党都有深刻观察的郑丽文，以及曾任《中国时报》总编辑、现任《旺报》社长的黄清龙等人。我们谈到了七个方面的问题，既关注国民党转型中党机器的运行情况，如党内竞争与协调机制、“中央”和地方基层党组织、党的文宣系统，以及人才选拔培养机制等，也关注转型中的党与资本的关系、党与政权的关系、党机器与选举的关系等问题。



竞争与党内利益冲突

在威权时期，国民党通过提名地方政治精英参选党议员，并为其提供竞选经费和配票，以保障其顺利当选，将地方精英纳入到政治统治之中，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

但是，随着民主政治转型，尤其是2000年政权轮替之后，国民党党产资源的萎缩、党机器的弱化，使得党不再拥有权威和能力提名议员，同时也不能以政治资源的给予来换取他们对党的忠诚。参加选举的人主要依靠自身实力赢得选举，他们往往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和资金来源。而且，在2000年新的提名制度中，国民党将民意调查纳入正式提名机制，并占有70%的比重，强化了参选人作为民意代表的分量。对于那些参选国会议员的人来说，党的标签更多是为了增加选民对其本人的认同；而对于参选地方议员的人来说，选民“选人重于选党”，政党的标签作用明显减弱。

因此，国民党与其“议员”（民意代表）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从前的“侍从关系”。议员往往把选区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民意为借口不支持党中央的决策；或只顾自身的政治前途与党唱反调，阻碍党的政策主张的形成与执行。这些造成了党内意见不一致，个人意志与党意志发生冲突，使得党内凝聚力减弱，执政效能下降。不仅如此，民意代表的问政、对“总统”和行政官员的质询和抵制，再加上媒体的传播和放大，往往使官威扫地，公权力被大大削弱。

2012年5月的“美牛案”便是很好的例证。面对民进党立法委员对通过美国牛肉进口案的阻挠，马英九亲口下达党纪命令，规定国民党立委不得有其他意见，要求无论如何，美牛案要在本会期通过。但是由于国民党立委很多出自养殖业极多的农村，他们的选民都反对美国牛肉进口，如果支持“党中央”，就会得罪自己的选民，因此他们只是消极服从，并没有人愿意与民进党发生冲突。台湾媒体将这次立法院美牛大战中“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士气涣散，视为马英九成为“跛脚总统”的开始。

基层组织的瓦解

政党轮替之前，国民党在各政府机关、各行业、各企业中都有党组织，以党领政，党国体系相对完备，并保证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层到基层皆能完整贯彻党的意志。政党轮替后，迫于反对党和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从军队、媒体、行业、企业中撤出，大量党组织被迫取消或自动解散，党组织只在四个层级保留：中央—县市—区—里。在都会区，里以下的党组织已经不存在实体性组织，在县区，乡以下党组织也大多瓦解。与此同时，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严格的组织生活基本消失了。党的活动大多转换为联谊会形式，组织的约束力和效率大幅度减弱。



2000年丢掉政权后，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组织了国民党改造工作，其内容大致包括：（1）大幅度精简人员，国民党专职党工从2000多人骤减为500多人，从县市党部到乡镇党部，大批党工失业，一个乡里只保留一位专职党工；（2）精简组织层级，取消省党部，党中央的大量一级单位（比如妇女、青工、海外部门）降为二级单位；（3）设立国策基金会，安置大批失去工作的国民党政务官，同时组织他们研究国策和政策，一方面借以支持“立法会”国民党议员与民进党争斗，一方面为下一轮选举执政储备人才。

党产的萎缩与金钱政治的影响增大

面对政权交替，国民党的几千亿党产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党产中有一部分是由后来的经济发展而来，但主要被民进党攻击的是二战之后国民政府来台接收时所承接的公家财产以及后来一党专政时期占有或垄断的巨额资产。一直以来，民进党都将党产问题作为攻击国民党的重要手段。有人戏称，国民党的党产是民进党的提款机。

在民进党的施压下，国民党卖掉了大部分党产。缺乏党产的国民党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有能力与资本力量博弈，逐渐成为资本家影响渗透的对象。缺乏党产，也使国民党无力再凭借财力和资源动员地方派系，而失去地方派系基础的国民党，越来越依赖资本家的政治献金来进行政治动员。目前，国民党的经费主要来自三块，一块是党费，所占比例很小，一块是竞选中的财政补助，平均每年可获6亿—7亿台币，再有就是政治献金了。因此，在未来的政治局势中，金钱政治的影响势必越来越大，资本将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导致政党执政自主性的弱化。

文宣功能的转变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党的文化宣传事业拥有庞大的资源和管道。国民党控制着仅有的三家电视台（中视、华视、台视），党报《中央日报》是主要的平面媒体，中央通讯社是党的喉舌，党还控制着最大的广播电台、书局和电影公司等。政权交替之后，立法院通过了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条例，国民党只保留了《中央日报》和《中华日报》。到了马英九执政时期，连《中央日报》也因长期亏损被关闭了，仅有网站还在。台南地区的地方性媒体《中华日报》成为国民党拥有的唯一党内媒体。原先党的文宣文化机构几乎全部国营化了。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文宣主要为选举服务。连战担任党主席时期，在短短四年中曾换了五任宣传部长，可见国民党文宣工作的转型面临很大压力。因为党不再管控媒体、主导舆论，又处于在野党位置，需要更加积极地与媒体合作。2000年末，台湾的电视媒体开辟了政论类节目，成为两党政策宣讲和选战辩论的重要舞台。连战组建了工作小组专门负责为每位参加政论节目的党代表搜集舆论和资料，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也常常邀集党内人才定期召开会议，为各种辩论出谋划策、设置议题。在选战中，文宣制定各种策略为党赢



得更多选票，在这种情况下，文宣对党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往往不再重要，而越来越受制于选民的现实诉求，被民意所左右。

干部培训选拔机制严重弱化

在民主转型后，政务官系统已经从传统的党内推荐转向由社会管道输送。原先党的人才培训机构，比如“革命实践研究院”（类似于中央党校）都已精简，有的连校址都已卖掉，训练只能到外面借场地进行。过去的培训多则半年，少则一个月，现在则仅有一天。作为党的后备军的团系统也式微了，已经蜕变成为青年或青少年的联谊活动。

党在选拔、推荐人才上的作用也大大减弱了。过去党有能力推荐人才，将地方精英有效纳入统治体系之中。但在民选政治条件下，党不再有资源和能力推荐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参选人主要依靠自身实力，党也不能再根据对党的忠诚度来提拔人选，参选者也不再凭借与党的关系和忠诚度当选。

因此，过去的组织系统和培养人才机制已经严重弱化了，不能再支撑党的人才体系，党和国家的主要干部很多来自社会输送。因为民主政治的胜选者要拥有广泛的人脉和金钱，没钱没势的优异者很难进入，因此也很难做到选贤任能，反而容易导致党内凝聚力差、个人意志与党的意志不相协调。

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与调和 2008 年，国民党重新赢得大选，夺回政权。一般而言，每逢“总统”换人，便会有近万个职位需要重新分配。政党政治的要诀在于，赢得政权，政党“分赃”。这对于政党精英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政治动力。但由于台湾民主不是原发性民主，而是引入外部民主制度，在权力分配上便面临着观念、利益以及其他方面的冲突。

马英九上台，当时靠的一是陈水扁贪腐，民众痛恨；二是个人形象清廉，基本未依靠党的机器，这使马英九对国民党组织的依赖程度不深。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传统利益盘根错节，官僚化的国民党各利益集团尾大不掉，马英九极欲甩掉包袱。更为重要的是，马英九本人深受西方政治理念影响，上任后坚持要做超越党派的“全民总统”，希望以此化解族群对立，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马英九的“全民总统”理念导致他大量延聘专家型人才和体制内的事务官，而置大量拥护他并在选战中出力的党内精英不顾，使他们不能进入国家政权体系，由此造成党与国的矛盾，并进一步打压了国民党内精英效忠追随党的积极性，使得国民党组织进一步受到削弱。

自 2009 年以后，随着马英九个人声望的下降，一系列选战的压力（台湾每四年有三次重要选举：“总统”选举、“立法会”选举、县市长选举），马英九不得不重任国民党主



席（总统、主席一肩挑），重新依靠党的机器为其选战提供支持，并同时通过党机器来统一“立法会”国民党议员以及地方派系的意志，以利于执政。然而，由于党内精英通过选战进入政权的管道仍然不畅通，同时也由于马英九在整合国民党内各派系时缺乏办法和手段，国民党的组织效能仍然在大幅减弱。

向“选举机器”转型的国民党

在访谈中，笔者发现，所有国民党的受访人关注重点都是选举，按他们的说法，“没有政权，一切都免谈”，但一旦提到国民党正在蜕变为一个选举机器时，所有受访者又都心有不甘，不希望国民党仅沦为一部选举机器。笔者认为，这深刻地反映了国民党作为一个传统的“革命党”在民主政治条件下自身定位的窘境。

以台北市党部为例，党组织的全部工作几乎都是选战，每逢选举，才有组织活动，没有选举，什么事都没有。一般而言，选举有政见发表会、造势活动、催票、拜票等多个环节，每逢选举，市党部就会召集各种联谊会，向党员介绍选情和党的主张，并分派造势活动各个区、里的动员人数，造势活动后，再通过信件、短信等方式向选民表达政见，选举前通过电话进行催票，选后再陪选举人逐一拜票。关于选举，国民党已经操作得相当熟练，但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其他功能，却都在迅速弱化。

比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及宣传，党组织培养选拔人才的机制，党制定长期战略并加以实施的能力，以及党动员群众实现共同目标的功能，都在民主选战的强大压力下逐一消失，选票成为唯一支配性因素，民意的短期诉求压倒政党的政治主张。在今天的台湾，政治行为短期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多年的选举民主竞争，台湾早期的政治参与热情已经消退，民众的政治冷漠感正在出现，政治在民主的旗号之下已经逐渐蜕变为少数精英的游戏，政党已经不能代表人民，“代表性断裂”等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弊端也已经开始在台湾出现。这种局面，恐怕是政治转型之初的台湾人所未能料及的。

（原题为：《从执政党到议会民主党的转型之痛——台湾国民党转型的经验与教训》）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论】

8-4 郭忠华：西方政党与民主：在共生和悖论的结构中



郭忠华：中山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

没有民主，政党就不具有其存在的基础，而没有政党，现代民主则不可能得到实现。但是，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倾向、中间人投票定律以及现代兼容型政党等内在走势，又从不同的方面蚕食了民主的基础。

”

近代以来，西方政党与民主在一种共生和悖论的结构中发展。没有民主，政党就不具有其存在的基础，而没有政党，现代民主则不可能得到实现。政党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性关系。但是，从现代西方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倾向、中间人投票定律以及现代兼容型政党等内在走势，又从不同的方面蚕食了民主的基础。政党与民主之间从而存在着一种悖论性关系。政党与民主之间的这种发展结构，是民主在规范层面和经验层面之间动态发展的反映。

政党与民主之间的共生①

西方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国家。但是，作为不争的事实，这些国家都超出了古希腊城邦的范围，所有公民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直接民主显然已经没有实行的可能。民主的政治要求与西方国家的现实国情相结合，要求它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变通或限制，使它以间接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成为顺应这种要求的产物。它不仅解决了民主与人口之间的张力，而且还保证了民主的实施质量。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对代议制民主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除开人数最少的社会，民主的有效范围不会没有某种局限性。在人数众多的社会中，局限性更大，因大量问题迫切需要间接的决策而使这种情况难以避免。的确，设立代表机构就是有意缩小民主的有效范围，这种机构常常是必不可少而且合乎需要。”［1］约翰·密尔则对代议制在保证民主质量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进行了



论述。他指出：“一切旨在成为好政府的政府，都是由存在于社会各个成员中的一部分好的品质为管理集体事务而组成的。代议制政体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社会中现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诚实，以及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并赋予他们以在政府中较之在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下一般具有的更大的影响。”[2] 然而，代议制民主作为架通人民民主与治国精英的桥梁，是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来实现的。脱离了现代政党，代议制民主也就无法实现。

我们可以从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理解政党与民主之间的共生关系。它认为，经济和政治虽然差异迥然，但却都是人类的经济、人类的政治，内在于其中的是人性中最难以改变的自利性。[3] 但是，自利并不是恶，而是正当的、完全符合道德原则的。在经济生活中，自利使人们理性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并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促进了经济繁荣，使成功者从严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企业家。在政治生活中，自利则驱使公民时刻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做出各种政治选择，同时也驱使政治积极分子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使之从更为严酷的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家。公平竞争的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民主政治实际上通行同样的原则，即交易费用的最小化和收益的最大化。如果从公共选择的视角衡量，我们可以把民主看作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公平竞争机制，竞争的目标是该国的稀缺政治资源，如总统的职位、议会的议席等。竞争越完全，政治也就越民主。政党是为节约政治交易费用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其目标是要实现人民主权，使主权者能够节约交易费用。同时，通过政党的过滤作用，把大众民主转换成精英民主，从而保证政治民主质量。

在代议民主的政治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公民通过其手中的选票来兑现其作为主权者的权利，通过竞争选民的选票，使政治家或政党脱颖而出，成为主权者的代理人，并转换为精英民主。但是，正如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没有交易费用的完备市场制度不可能存在一样，在政治生活领域，也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信息费用或交易费用的完全政治民主。不论在什么时候，政治活动都不会是免费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使民主变得不再完全。对于投票者来说，这些费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投票者在时间、精力和金钱等方面所付出的成本。任何投票者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是有限的，参加投票活动可能使投票者付出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它们都必须由个人所承担，但他从事投票所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却不那么确定，或者即使确定，也是由整个社会所分享。二是投票者在收集信息方面所付出的费用。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常态，投票者参与投票通常需要搜集各方面的信息，而搜集信息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等。交易费用的存在使投票者不可能对政治问题或者政治候选人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投票者也没有充分的积极性去获得更多的信息，甚至即使掌握了相当多的知识，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利用。[4] 这些情况说明，民主不



可能是完全的，不完全民主才是常态，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5]

不完全民主的常态使政党组织的介入成为必须。在不完全民主的条件下，为了节省选民在选择议员或政治性行政官员时所付出的高昂交易费用，或为了节省后者在寻求选民支持时所形成的庞大交易费用，就必须具有一种专业性政治组织。它一方面可以代表选民来选择议员或政治性行政官员，另一方面又能够代表后者来寻求选民的支持，这种组织就是现代大众型政党。国内学者毛寿龙在谈到现代政党的功能时指出：“政党组织是代表选民来选择议员和政治性行政官员，同时也为议员和政治性行政官员寻求选民支持的专业性组织。政党实际上是节约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交易费用的产物。”[6] 哈德罗·德姆塞茨则从相反的角度阐述了政党的功能。他指出：“如果政治民主是完全的，政党就几乎没有存在的理由。”[7] 可见，政党是不完全民主的产物，是在人类社会已经有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但又不可能实行全体社会成员直接管理的条件下，为了节约主权者与其代理人之间的交易费用而产生的政治组织，是少数代理人与多数主权者之间的中介性组织。政党存在的理由是，要以较低的技术和费用来实现人民主权的原则。正如李景鹏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政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在“人类的政治发展已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使得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多数)能够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成长到能够直接管理社会(即不需要借助于凌驾在社会之上的组织而由全体社会成员直接管理)的程度。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人类的政治发展所提供的能使多数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条件、形式、方法等等，同时又在限制着人们对于社会的直接管理。这样便形成在多数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条件下的少数人的政治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党政治。”[8]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党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和集团所组成，它树立起鲜明的党纲和党章，提出明确的执政方案，郑重推出其候选人，并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和各种宣传工具，向选民反复宣传其政纲和候选人，以便使自己政纲为选民所接受，把自己的候选人输送到总统、首相或议员等岗位上去。政党的行为降低了选民的时间、精力和信息费用等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候选人在吸引选票方面所产生的通常是极其庞大的费用。在政治选举中，政党的通常方略是：针砭社会问题，确立自己的政治立场，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推出将要实施这些方案的候选人。问题、立场、方案和候选人四位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竞选纲领。它与其他政党的竞选纲领结合在一起，供选民判别和选择。这样不仅使问题得到了集中，而且还降低了选民在面对分散问题时所存在的无力感，使之从幻觉上感到自己对政治结果的投资影响力上升了，满足了选民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偏好。

总之，政党的存在无不以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交易费用为基础。政党的功能就在于节约双方的交易费用，拉平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实现人民民主的主权原则

和精英民主的治国方式。民主是政党政治的舞台，而政党则是实现民主的手段，两者缺一不可。

政党与民主之间的悖论

从社会历史角度看，早期政党的活动只局限于议会或政府内部，并没有将触角延伸到社会，使各社会阶层的民众都卷入到政党的活动中来。1832 年英国的议会改革，使选举竞争从议会内转向议会外，导致政党性质发生根本性变革，即从派别性、体制内政党向现代大众型政党转变。自此以后，任何政党想要在轮流执政的格局中获胜，都不能停留在议会或政府内部，而必须走向社会，依靠社会大众的支持才能上台执政。获得选票的压力还使政党建立起强固而庞大的全国性组织。着名政治社会学家奥罗姆指出：“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现代政党才充分具备了它的外部标志——强有力的组织和公众卷入。”[9] 但是，强有力政党组织的出现和社会大众的大量卷入，却不同程度地使政党走向与民主相背反的一面，这就是突出体现在如下的三大悖论。

首先，政党的寡头化与民主之间的悖论。在现代西方国家，人民主权不可能通过社会大众的普遍直接管理来得到实现，而必须借助于政党，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间接地实现这一目标。从政党与民主之间的正向关联角度看，政党组织、交易费用与选民利益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政党组织的规模越大、组织化程度越高，政党也就越坚强有力，它就越能为其选民节约交易费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选民的利益。但是，政党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也产生了与民主的发展要求相背谬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政党的官僚化和寡头化发展趋势上。随着政党组织的扩大和纪律的加强，必然会发展出一套专业化的政党官僚来主管党务，而且领袖在政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会越来越得到加强。随着领袖地位的加强和政党官僚化的发展，政党的发展目标也发生相应的蜕化，成为把自身的生存当作第一需要，而其原来服务于选民的目标则被放弃，加上政党在政治过程中掌握着比普通选民多得多的政治资源，政党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一般选民等因素，造成选民对政党和政治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的结果。[10] 随着政党官僚化和寡头化趋势的发展，本来旨在实现民主目标的政党却变成了一股反民主的力量。诚如罗伯特·米歇尔斯所言：“任何政党组织都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寡头化权力。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我们总是发现当选领袖具有对于选举他们的大众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一寡头结构窒息了民主的基本原则。”[11]

其次，中间人投票定律与民主之间的悖论。与代议制民主相关联的是竞争型政党制度，主要体现为两党制和多党制等形式。不论哪一种形式，政党的竞选和施政纲领都是其选民的公共物品偏好的集中反映。政纲实质上是政党为选民所提供的一揽子公共物品。在竞选过程中，为了赢得多数选票，政党必须尽可能许诺为最大多数的选民提供他们所希望



的公共物品。竞争型政党制度始终存在中间人投票定律的现象和趋势。在两党制下，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如果政纲是单维度的，而且选民的偏好也正好呈单峰正态分布，那么将政纲设定在中间投票人位置上的政党就能够赢得最大多数选票，这是两党制下中间人投票定律的体现。[12] 在多党制下，选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政党所提供的一揽子公共物品也更贴近特定选民的偏好，但它同样存在按照中间人投票定律运作的选举。那就是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很少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单独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通过妥协和联合等方式而首先演化成为一个两极化的多党联盟结构，然后再通过这种两极化的政党联盟向中位选民的偏好趋拢，从而形成多党制下的中间人投票定律。[13]

中间人投票定律对民主所构成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政党过度趋同所带来的危险上。在大选中，任何想要赢得选举的政党都必须将自己的政纲设定在中间层次上，使得各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异越来越小，意识形态越来越不存在原则性差别。政党的这种发展趋势对社会大众所造成的普遍印象是：政党之间的一致性大于彼此存在的分歧，政党在基本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纲等方面都存在着大量的雷同之处，政党竞争总是围绕着一些微小和细枝末节的事情而展开。民主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之上。这种多元化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上，而且还体现在政党竞选纲领的多元化上。民主不仅需要一致，而且更需要以多元化为基础的冲突和竞争。当中间人投票定律使政党之间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不断拉拢和趋同的时候，不仅会导致社会大众对政治参与的冷漠，而且还会削弱政党的民主功能，造成能否赢得选举主要取决于政党候选人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政党的公共亲和力的结果。查特尔·墨菲指出：“民主的危险不仅出现在它所体现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同和效忠的时候，当它的竞争性的动力被太多的一致性所限制时，民主也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常常是掩盖着令人不安的冷漠假象。”[14]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中间人投票定律导致政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交叉趋同，由此导致政治冷漠和政党民主功能削弱的现象，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已经得到了印证。

最后，现代兼容型政党或全方位政党与民主之间的悖论。二战以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大部分都建立在特定人群的基础之上。如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主要局限在工人阶级身上，农民党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农民身上，天主教党主要集中在天主教徒身上等。但是，伴随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条件的变化，公民权利的扩展和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成熟，这些国家的主要政党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型，越来越向规模庞大、意识形态暧昧、超越特定人群基础和尽量包容各方面关注和需要的方向发展。德国政治学家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创造性地用“兼容型政党”(catch-all party)来描述这种新型的政党。兼容型政党的特征主要有：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上层领导集团的地位加强；单个党员的作用下降；减少对某一个具体社会阶层的重视以利于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更广泛地吸收支持者；保持和各种利益集团接近的渠道等。[15] 工人、农民、商人、天主教



徒、妇女等阶级或团体的利益，只要你能举得出来，兼容型政党都试图去代表。兼容型政党在当代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日本的自民党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兼容型政党的出现与中间人投票定律相关联。在竞争性政党民主的格局下，任何旨在获得大选胜利的政党都必须努力去代表最大多数选民的利益，以致迈克尔·罗斯金指出：“要想获得大选胜利就必须成为‘兼容型政党’，这几乎成了一条公理。”[16] 兼容型政党的出现是选票逻辑的产物，但却不利于民主的发展。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它日益淡化了政党的集体认同感。[17] 政党的集体认同必须以特定的社会群体为基础。当政党日益超越自身的群体基础而扩展到其他社会群体时，它也就必须越来越多地放弃其原有的价值观和集体认同。兼容型政党的发展与集体认同感的淡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政党集体认同感的淡化显然容易使民主偏离其价值追求而走向完全形式主义的轨道。另外，全方位政党的出现也使政党之间的竞争性民主转换为政党组织内部的派系斗争。由于兼容型政党十分庞大，组织内部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党内派系林立，使得围绕重大问题而展开的斗争主要发生在党内，而不是党派之间。[18] 这种情况使发生在社会大众之间的选票竞争转换为政党内部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政党组织的发展导致反民主倾向的产生。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以外，政党与民主的悖论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如政党政治的决策活动容易对一些小型社会团体的公民利益造成损害，从而损害民主的平等原则等。总之，无论是何种悖论，作为一条总体性规律，政党本来是为民主而生的，但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寡头化趋势、中间人投票定律以及兼容型政党的走向等，也使之越来越蚕食了民主的基础。

政党与民主关系的思考

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透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与民主，既展现了政党在实现代议制民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支撑性作用，也展现了政党对民主所造成的异化后果。然而，对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共生性和悖论性的解读，还有赖于我们从更深层次去思考民主的内涵及其对现实生活的意义。

民主历来存在“两张面孔”：规范性面孔和经验性面孔。[19] 前者表现为价值层面的追求，后者表现为经验层面的制度、程序等。民主的价值追求表现为人类社会对理想的公共生活的追求和设计，如自然权利、人民主权和社会自治等；规范层面的民主体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民主的经验层面表现为现实的民主制度，如普选制、代议制、政党政治、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等；经验层面的民主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或程序设计。千百年来，民主始终是在这种规范与经验的结构中得到实现的。以古希腊雅典的城邦



民主为例，它旨在通过公域与私域的严格界分、通过全体公民的直接参与、通过演说和辩论来说服其他公民等程序性设计，达到充分展现个人德性、创立某种永恒功业、实现永恒和不朽等价值追求。从这种角度出发，可以看出，在政党与民主之间的共生和悖论关系后面，隐含的实质上是民主的“两张面孔”之间的关系。政党与民主的共生关系体现了在人民主权的规范性价值条件下，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来实现这一价值追求。具体地说，由于现代国家都建立在利益分化、疆域辽阔和人口众多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公民个人的经常性政治参与来实现其作为主权者的权利，通过政治家个人的活动来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势必产生令人难以承受并足以使之退出这种活动的交易成本，使个人的主权在分散和杂多的主权者中无限趋近于零，最终导致人民主权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政党组织的介入，使选民和政治家的交易成本得到了极大的减少，使个人左右选举结果的心理幻觉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等。正是通过这些条件，才使得人民主权在现代民族国家具有其现实可能性。从这个层面上说，政党代表了民主的经验性面孔，它从制度和程序上使民主变得现实可行。

民主的规范面孔和经验面孔也并不总是表里如一，“两张面孔”之间的偏差有时也会变得非常刺目。当过分强调民主的程序而忽视其价值追求时，就会使民主走向异化。前面所论述的政党与民主之间的悖论性关系，其实反映了民主发展的工具化趋势，反映了经验层次凌驾于价值层次之上的倾向。那就是，民主仅仅成为一套游戏规则或选举程序，选票逻辑成为民主赖以展开的核心，把获得最大多数选票作为民主的目的，忽视了民主的自由、平等、权利和自治等价值追求。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两张面孔”之间出现偏差的情况并不少见。法西斯党徒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登上权力宝座的。但是，这并不说明法西斯暴政具有其政治合法性，而只是说明，当民主丧失其规范价值而完全演化为经验程序时所能招致的危险。无政府主义向往民主的价值，并不遗余力地将这种价值兑现在现实社会中。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是有目共睹的，究其根本，在于它过度强调了自主和自治的价值而降低了民主制度或程序所具有的重要性。可见，民主的“两张面孔”缺一不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张面孔或过度强调其中哪一张面孔，都足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较之于雅典城邦民主，现代民主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古典民主表现为全体公民直接参与的“人民的统治”，而现代民主则是权力委托和责任机制基础上的“人民的同意”，它以政党或政治领袖所能提供给民众的有效选择为前提。“人民的同意”既隐含了主权在民的价值原则，又隐含了相关的制度设计。但是，在民主的价值追求与民主的经验实践之间，总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一种制度的设计即使几近完美，也会因操作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条件限制而难以兑现其设计的初衷。这点对于旨在实现民主理想的政党组织来说也一样。尽管它旨在实现人民主权的理想，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负面的功能。然而，这并不足以因此而放弃对民主理想的追求。在民主的现实化问题上，卢梭曾不



无清醒地指出：“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20] 民主的价值不在于这样一种理想在现实社会中何时或如何可以得到实现，而在于这种理想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所带来的希望和力量。如果从这种意义考察，将会使我们认识到，政党对民主的促进不过是人类在追求良善生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部分硕果，而两者之间的悖论则是其中的变奏曲，追求的过程并不会因此而悬搁。

注释：

①对于政党与民主之间的共生关系，国内学者毛寿龙和李瑞昌曾做过极具启发性的论述。本部分借鉴了两位学者的观点，参阅了毛寿龙的《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李瑞昌的《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晶：政党与民主》(《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并向他们表达由衷的谢意。

【参考文献】

[1]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页。

[2]J. S. 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页。

[3]柯武刚. 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2页。

[4][6]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第232页。

[5]李瑞昌：《现代政治民主的结晶：政党与民主》，《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

[7]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纬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7页。

[8]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9]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

[10]孙关宏等：《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11]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的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12][13]参见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225页、第273页。

[14]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15]戴维·米勒.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9 页。

[16][18]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2 页、第 222-223 页。

[17]Claus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M]. London: Hutchinson & Co.(publishers) Ltd, 1984, P187。

[19]何历宇：《民主：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复旦学报》2004 年第 3 期。

[20]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88 页。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5 刘军宁：党内民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刘军宁：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

松散的组织是没有战斗力的。然而严密的组织与民主政治是相冲突的。民主的政党，其组织纪律性不能太强。通常的情形是，外部民主越少，内部纪律就越严。因为政党越松散，越开放，就越有包容力，群众基础就越广泛，当然也就越有代表性。

”

党内民主不等于党内选举，甚至不等于差额选举。检验民主的尺度不是看是否有选举，而是要看是否有竞争者、挑战者，他们是否有言论自由。如果没有后两点，就没有党内民主。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党内民主是其基本组成部分。政党的民主化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在党内实行民主？

党内民主的第一要求就是党的领导人须通过竞选的方式产生。党内是否有公开、健康、透明的政治竞争，是衡量党内民主的关键尺度。就是说，党的最高领导人，是由某个人或小团体指定的？还是通过公开的、充分竞争的、公平的、选举产生？党内的派别是不是公开合法的？如果是由指定的或秘密协商的方式产生的，那么这种做法肯定是不民主的。

党内民主不等于党内选举，甚至不等于差额选举。检验民主的尺度不是看是否有选举，而是要看是否有竞争者、挑战者，他们是否有言论自由。如果没有后两点，就没有党内民主。不仅最高一级的领导人是以民主方式产生的，而且地方的政党领导人也是以民主方式产生的，即通过公平的、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来产生，而不是由党的领导人或党的组织部门任命来产生的。

实现党内民主，必须建立一套民主的党内权力结构，即党的内部组织结构的民主化。换句话说，党内民主要求党内的权力构成是由下至上、以民主程序逐级授权形成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在全党之下，而不是在全党之上。党内民主没有党中央和领导核心，党中央和领导核心的存在意味着权力结构是由上至下的、由核心到外围的。以美国为例，共和民主

两党都没有中央委员会，都不实行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党内民主应该落实在民主上，而不是落在集中上。

党内民主同样应该体现在政党的组织方式上。按照通常的理解，松散的组织是没有战斗力的。然而（尤其是形式上）严密的组织与民主政治是相冲突的。民主的政党，其组织纪律性不能太强。通常的情形是，外部民主越少，内部纪律（至少在形式上）就越严。因为政党越松散，越开放，就越有包容力，群众基础就越广泛，当然也就越有代表性。

党内民主也反映在政党的扩展方式上。个人参加政党是个人自主决定的，还是被政党决定的？一个公民是哪个党的党员，是由该公民自己个人决定的，而不是党组织决定的。只有入党的决定权在个人那里，这样的政党才是民主的。自主入党是党员和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是结社自由的具体体现。党员对党的参与度与忠诚度是靠政党的代表性和包容度决定的，而不是靠纪律与惩罚或是分赃多少决定的。民主政治下，没有叛党一说，自由改换政党是公民结社自由与政治参与权利的应有之意。 党员所享有的公民权利高于对其政党所承担的义务，所以，政党不能强迫其党员（宣誓）放弃党员作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不能强迫党员永远效忠，更不能强迫党员献出生命。

党内民主需要充分的外在条件，没有充分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没有多党竞争，是不会有党内民主的。在民主政治之下，各政党内部必须民主。如果一个政党不民主、不包容，就很难争取到党员和选票，无法获得选民的参加和支持，无法在选举中获胜，因而也难以生存。党内民主是政党的事，而不是全民的事。

民主政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党内民主，不是基层民主，不是全民民主，不是人民民主，不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自由民主，是宪政民主，是代议民主。

总之，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党内民主。党内民主不可能独立于（自由的、宪政的）民主政治而独立存在。党内民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原题为：《刘军宁：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在党内实行民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照】

8-6 袁超：浅谈美国的政党与政党制度

袁超：《阳光》杂志特约撰稿人。

“

影响美国政治过程的不是单一执政党的意志，也并非两大党不同意志的碰撞、妥协，而是不同国家机构之间就政策本身而进行的博弈，这种博弈不具有明显的政党色彩。可见，政党在美国只是一个能够获取选民支持、最终赢得执掌国家权力机会的平台。

”

政党对于一国政治发展的作用方式、大小总体上取决于该国的宏观国家制度架构，具体则主要受到该国的宪法、法律规范、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等影响。当然，美国的政党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受到立法、司法等制度的重要影响，但限于篇幅，此处仅主要从政党制度的角度，简要分析美国政党。

政党与两党制的特点

应该说，政党与政党制度之间是一个相互塑造的关系，政党的特点与政党制度的特点紧密相连。学者们一直认为美国的政党，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党相比较，具有十分显着的特点：

其一，美国政党注重现实而不执着于主义。美国的政党所重视的是如何应付现实问题，而不是追求理想主义。

其二，党的地方组织强于中央组织。美国两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每四年选举总统之前召开，以产生总统候选人及起草政纲宣言，会议结束后无任何活动，中央委员会也只在总统选举之年最为活跃，其余时间，除在中期选举年从事国会两院议员选举外，很少有所作为。而党的地方组织是党的基础之所在，尤其选区委员会是全年为党工作，巩固党的基础，地位十分重要。

其三，党的各级组织无自上而下的领导指挥体系。美国政党各级委员会的权力不存在自上而下的安排。除了财政支持以外，中央委员会不能指挥州委员会，州委员会也不能指



挥郡委员会。州和地方党部的组织，大都是自主的团体，所以分权制为美国两大政党最主要的特征。

其四，不存在固定的全国政党领袖。由于美国的政党实行分权制，全国性的领袖既不是党中元老，也不是采用选举方式产生的，而是以该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者为领袖。政党为了能够在选举中获胜而推选当时社会上有号召力的人为总统候选人。比如，美墨战争的英雄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麦金莱、二战的英雄艾森豪·威尔都曾经是被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原因不言而喻。

其五，没有反对党观念。英国在责任内阁制度下，认为民主政治不仅要求有一个在国会中的多数党，而且要求一个国会中的少数党，多数党组织政府治理国家，少数党在国会中批评监督政府。与英国的执政党和反对党状况不同，美国的在野党不一定为少数党，白宫与国会可能会是各自不同的政党居多数，因此，反对政府的可能是多数党。

美国政党的这些特点实际上也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塑造和维持了美国的两党制。那么，美国的两党制又有什么特点呢?国内政党研究学者周淑真在《政党政治学》一书中，归纳了美国两党制的五个特点：

第一，美国的两党制主要是通过总统选举实现的。总统所属的政党为执政党，执政党地位的确定是总统选举的结果，而非国会选举的结果。因此，执政党未必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当总统所属政党不是国会中多数党时，两党的对抗可能发展成为国会同政府的对抗，这种情况下，两党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过程。

第二，美国两大政党之间的政治分野不明显，没有大的差别。两党党员在选举过程中常常跨党投票，跨党派的现象一方面有利于把最合乎民意的人推上总统宝座或入选国会;但另一方面，跨党派现象模糊了阶级，淡化了政党代表和追求特殊利益的现象。

第三，美国的两党制是区别于英国的独特的两党制。即使总统所属政党同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也不能总是保证总统和国会的一致，而在英国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总统不能给国会中的本党组织下命令，国会议员也享有很大的独立性。因此，不管国会、白宫内出现怎样的不同政党人数比例，其政治过程都充满着不确定性。

第四，美国两党制比较稳定。100多年来，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基本上一直保持着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的格局，虽然也曾出现过第三党运动，但没有对两大党形成大的威胁。第三党没能产生大的影响力，也可看作是因为两大党能够及时进行自我调适以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不同利益格局。稳定、成熟的两党制有利于美国的政治稳定。

第五，21世纪初，一些标志性的事件预示着美国两党制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是2000年总统选举，民主党派的戈尔在赢得多数选民票数的情况下，因佛罗里达州选票的争



议，却未赢得多数的选举人团票，导致其选举失利。二是2008年总统大选，奥巴马以非洲人后裔和有色人种的身份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

通过对美国政党和两党制特点的归纳，大概可以综合得出一个结论，即影响美国政治过程的不是一个单一执政党的意志，也并非两大党不同意志的碰撞、妥协(因为两大党没有明显的区别，没有各自固守的不可撼动的政党意志，只是在政策倾向上有所差异)，而是不同国家机构之间就政策本身而进行的博弈，这种博弈不具有明显的政党色彩。可见，政党在美国只是一个能够获取选民支持、最终赢得执掌国家权力机会的平台。

党代会及其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尽管美国的党代会也肩负着重要政治使命，但它对于美国政治过程的影响不至于那么重大。

美国的党代会有两项重要任务，一项是确定该党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的候选人，另一项则是确定该党未来四年的“执政纲领”。相比而言，党代会的第一项任务无论对于本党还是对于未来美国政治走向，乃至国家发展都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但是，自1972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开始采用通过预选的方式选出候选人以来，总统候选人不再在党代会上产生，而是在当年年初和年中预选中获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中产生，党代会对候选人的正式确定从此成为一个过场。党代会的第二项任务，所谓的制定该党未来四年的“执政纲领”，实际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党内各派对“执政纲领”的文字和精神的表述上面，比如1996年共和党的党代会上，党内不同派别就堕胎的论述意见产生了很大冲突。

如此看来，美国的党代会有点像在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出征”前开个大party的味道，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这样一个会议的内容仅仅是呈现了之前长时段政治过程的一个结果，而且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在整个预选过程中已经表现得七七八八，外界能够通过这样一个透明、公开的竞选过程与公民投票结果来确定各党的最终总统候选人名单，而无需等到党代会来宣布。

政党政治从其发源至今，已然不是一种政治模式那么简单，政党政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现象。美国的两党制有其历史渊源，更有在其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政治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复杂经验基础，种种因素促使政党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美国两大党界限的模糊、政策选择的相互融合、党员自由度的保持等种种特点使得美国的政党在发生着微妙的有超越于理论形态“政党”趋势的变化。政党组织“平台化”使得国家运行机制中政党意志色彩淡化，国家政策的出台并非是政党意志的绝对体现，也并非是两党意志妥协的结果，白宫与国会中多数党为同一政党情况下也会出现相互“扯皮”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美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的这些特点使美国呈现出与别国不同的特有政治生态。



（本文原载于《阳光杂志》总第 130 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7 徐贲：对美国“党性”政治的不信任与降级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美国的政党常被看作在起一种“补充宪法”的作用，它们以既平衡又维护宪法原则的方式，授予权力，又限制权力。这种权力是用来为全体选民办事的，不是用来对付对方，拖对方后腿的。一直到今天，美国国会还在学习如何克服和排除只受党性支配的政党政治。”

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出于对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断增加的担忧，把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顶级的AAA级下调至AA+级。这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历史上首次遭“降级”。在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后，白宫迅速作出反应，称标准普尔犯了严重错误。在这之前，标准普尔事先通报白宫的时候，白宫指责标准普尔结算的数据与实际情况有“数以万亿美元”出入。标准普尔修正了数据误差，但仍然坚持降级的决定，并声明：“美国国会和政府最近达成的财政巩固方案，不足以达到我们所认为稳固美国政府中期债务状况所需要的程度”。更重要的是，鉴于美国国会两党就财政政策有深刻分歧，标准普尔“对国会和政府是否有能力把它们本周达成的协议变成更广范围的财政巩固方案、尽快稳定债务形势”感到悲观。8月6日，美国许多报纸指出，标准普尔担忧的并不仅仅是数据，而是美国政党的“党性”太强，相互之间严重对立冲突，没有协商诚意。

在辩论国家预算和国债上限时，共和（含茶党）、民主两党在国会中各自坚守“党性”，不愿妥协，久久僵持不下。这样的党派“原则”和“路线”之争，在民众眼里，是把党的利益放置在公众和国家利益之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和《华盛顿邮报》7月28-31日的一项民意调查，1001位接受调查的成年人中，有72%对各政党在这一决策过程中的表现表示不满。与此相比，持中立立场的为11%，持肯定态度的仅为2%。对共和党、民主党和茶党的厌恶感有所增加的民众分别达到42%、30%和37%，增加好感的比例分别为11%、13%和11%，其余的维持不变（分别为44%、53%和45%）。

美国的政党常被看作在起一种“补充宪法”的作用，它们以既平衡又维护宪法原则的方式，授予权力，又限制权力。这种权力是用来为全体选民办事的，不是用来对付对方，拖对方后腿的。因此，一位总统候选人虽然代表某党，但若要赢得总统之职，必须在全国



范围内迎合更加广泛、更加各不相同的利益集团，这叫做超越党性。里根是一个以善于两党合作着称的总统，他在一些重要任命上常常会走中间路线，而无视共和党的右翼。

政党的“补充宪法”作用是温和、理性的，而坚持党性，绝不妥协，则是激进或极端的。美国人对民选政治代表的态度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把议员们看成是直接选民的代理者，应该为直接选民谋利益，争取政策的优惠；另一方面又认为，议员们进入的是一个更大的决策机构，有责任从整体公共利益的委托人（trustees）立场提出独立见解，代表整个国民共同体。

民代的这两种职能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大多数的民代都会至少照顾直接选民的利益，而同时也会对什么有益于他的政党和国家有独立的思考。至于具体偏重哪一种职能行为，则往往与他们参与协商的政策的性质有关，而预算或其他与钱财有关的问题是最具分裂性的。标准普尔担忧的是，如果没有政治人物的睿见、胸怀和担当精神，单靠美国的政治制度，解决不了不同政党之间分裂深，合作少的问题。

早在18世纪，杰出的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就指出，议会不应该成为不同政党在局部利益上相互讨价还价的场所。他说，来自各地域的代表应当与他们的直接选民保持密切的接触，但是，“国会不是敌对利益的民众大使们的聚会场所。国会议员不能像代理或说客一般，各自坚持一己的小群体利益。国会是国家的政治议会机构，国会只有一个利益，那就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在国会中，起指导作用的应该是以总体理性为基础的总体之好。”美国目前的政党政治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总体理性”，看来，一直到今天，美国还在学习民主政治中最艰难的一课，那就是如何克服和排除只受党性支配的政党政治。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8 弗农·波格丹诺：英国政党政治的兴衰


弗农·波格丹诺：牛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 **党员数量减少，大选参与人数减少，以及对政党的认同度下降，这些现象并不是只发生在英国。事实上，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它们都发生了。政党由此成为了最不被信任的社会组织之一。**

普选运动之前，政党政治就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代议制度的根基。但是，有现象表明，目前群众性政党正在逐渐走向终结，许多政党的存在根基已经出现了消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工党大约有一百万党员，而保守党大概是二百八十万党员。从那以后，两党的党员数量有了大幅度下降。1975 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保守党领袖时，保守党大概还有 150 万名党员。但是如今，这个数据已经降到了 25 万。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虽然保守党在超过一半的时间内处于执政地位，但是它却失去了五分之四的党员。1996 年年底，约翰·斯密斯和托尼·布莱尔发起的入党动员之后，工党的党员数量大概是四十万。而如今，工党的党员数量已经不到 20 万。在工党执政的最近几年内，工党失去了将近一半的党员。50 年前，11 个选民中有 1 个隶属于某一个党派，而如今 88 个选民中才有一个党员。此外，如今的选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觉得自己依附于某一个党派。1966 年，大概有百分之四十二的选民承认自己非常依附于自己选择的政党，如今这个数据已经降低到了百分之十三。这无疑是造成如今选民选举面向摇摆、选举参与人数减少（2001 年为具有资格选民的 59%，2005 年为 62%）等现象的原因之一。

党员数量减少，大选参与人数减少，以及对政党的认同度下降，这些现象并不是只发生在英国。事实上，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它们都发生了。政党由此成为了最不被信任的社会组织之一。欧洲晴雨表的一份调查显示，欧盟成员国中，只有 17%的受访者表示信赖政党，但是有 65%的受访者表示信任警察，还有 49%表示信赖教会。群众性政党的兴衰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部还未被人书写的大书。群众性政党死亡将会带来的影响势必十分深远。

政党政治在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段时间内达到了顶峰。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人们仍旧相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觉得可以使当时混乱的经济

发生质的改变。1945年，工党在自己的宣言中称：“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即使是在Croslandite的修正主义版本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仍然相信社会能被人类意志所改变。因此，工党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置身于进步社会观以及组织化的工人阶级之上，并且以后者的名义行动。当时的工党信条中有很明显的父权主义特征。1959年，Hugh Gaitskell对Richard Crossman说：“我们作为中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需持有深层次的谦虚。虽然这听上去可笑，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要领导他们，因为没有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他们将无法自己领导自己，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对工人阶级保持谦虚的态度。”

但是二十世纪后期的历史对于这样的观念并没有抛出橄榄枝。如果当初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势的工党或者是一个更为强势的工人阶级，那么社会或许的确能被随之改变。Aneurin Bevan显然是持这种观点。“历史给了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却没有抓住机会。现在，一切都已经太迟了”1959年，Aneurin Bevan在对他的记者朋友Geoffrey Goodman谈论英国工人阶级时曾如此说道。修正主义者的圣经《社会主义的明天》于1956年出版。书中，Anthony Crosland无奈地引用了恩格斯的担忧：“在如此长久的繁荣之后，大众已经产生了可悲的麻痹。”

在战后的英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小。1979年，大约有1300万人隶属于工会组织。如今，只有不到800万人隶属工会，而且工人阶级并不是一直持一种进步主义的社会观。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追寻的是个人以及家庭的进步，而不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解放。他们更支持Tony Benn所说的“个人从阶级向繁荣的逃离”，而这种逃离正是蚕食欧洲社会民主政治的癌细胞。用Ralf Dahrendorf的话来说，阶级运动已经被转化为个人化的社会动员。上面提到的那种父权主义看法也逐渐退去了，其中的原因在于，尽管领袖们仍旧努力实行领导，但是被领导者已经不愿意被领导，或者说被领导者已经不再将自己看成被领导者。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构成了当代政治的主题，因此，社会民主政治不得不走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创的道路。后者在1959年的波恩Bad Godesberg地区的一次发言中正式放弃了任何改造社会的理念。

群众性政党是集体主义时代的产物，因此它随着集体主义的消亡而消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政治领域因此出现了政治学家所说的由“立场”政治向“效价”政治的转变。在“立场”政治下，不同的政党在根本性问题上（比方说，基础工业的国有化，降低或者提高税率、保持或者放弃核武器等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而在“效价”政治下，不同的政党在根本性问题上并没有分歧，比方说各个政党都支持有效的国民医疗服务，更好的教育服务，各方的争议仅限于由哪个政党执政来实现这些共同的目标。



虽然群众性政党已经从根本上出现了消亡，但是政党对于政府机构的控制力仍旧如之前一般。另外，正如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的 Ben Rogers 所指出，如今的政治已经被职业化的政客所控制，这些职业政客将政治当作自己的工作，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确保自己能够维持在政坛的位置。如今的议员之间的相似度远远高于他们与各自理论上需要代表的选民之间的相似度。威斯敏斯特已经逐渐与人民切断了联系，它已经变成了职业政客的大本营，变成了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

地方政府也逐渐被职业政客所控制。过去，地方政府的官员往往是那些之前就在社区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人。但是，如今的地方政府官员往往都是因为与自己所在政党的联系而走上岗位。在大多数时候，地方议员只是他们党派在地方的使节，而不是其所在社区的代理人。他们不再被看成是“我们”的代表，而是被看成是“他们”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今的地方政府已经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抵抗来自中央政府的进攻。这样的进攻从撒切尔时代开始就时有发生。

地方权力机关和政党一样，已经不再是群众民主参与的途径。令人吃惊的是，在英格兰的十二个直选市长中，有六个是以自由参选人的身份参加的选举。很多人开始有这样一种意愿，他们希望代表他们的政治人物是有独立精神的人，而不是那些被党派政治所限制的人。

政治领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从而适应这变化了的现实。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撒切尔和 1997 年以后的布莱尔都试图改革他们所属的政党，从而使政党能够与他们自己对于政治领导的理解相一致。如今，大卫•卡梅伦正试图做同样的事情。2000 年 1 月，布莱尔曾这样说：“我从来不是真正的政坛中人。我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一个政客的成长过程，即使现在，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政客。”在我看来，布莱尔的意思是他并不是遵循政党政治原则的政客。撒切尔和布莱尔都是平民导向的领导人，他们都选择了越过各自党派，直接诉诸于大众。

群众性政党的死亡给民主政府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说政党已经不再是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那么选民们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老迈的机制？需要承认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政党仍将在政府组成与确保领袖通过选举机制向民众为其执政行为负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什么将会替代政党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21 世纪的民主实践将以什么形式进行？

与许多人所预料的不同，政党的消亡事实上并没有带来社区参与度以及社会资本的减少。调查显示，民众对于政治的热情仍然和过去一样强烈，而且英国民众仍然拥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在英国，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公民参加了志愿性质的社会组织，此外，大约有 300 万 18 到 24 岁之间的年轻人虽然参加选举投票的热情虽然不高，但是却每年都参加志



愿者活动。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一的英国成年人参加了海啸募捐，这个数据是美国的两倍，是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二到三倍。国家基金会大约有一百万会员，这个数字超过了所有党派党员数目的总和。民众的政治热情仍然很高，但是选民们已经不再将政党看成是政治参与的最好途径。或许他们的选择是对的。但是我们该如何进行机制设计从而引导民众的公民精神与政治参与？

1992年，在一册名为《激活大众性会员制度》的费边主义宣传手册上，高登·布朗认识到了以上这个问题。他写道：“在过去，想要改变社会的人加入了工党，他们希望通过选举代理人来促成社会变革。如今，他们想要自己做自己的代理人。”在布朗看来，类似租房者协会、居民社团、学校治理会以及社区协会这样的组织都是公民想做自己代理人的意愿的具体体现。不容质疑的是，在未来的民主实践中，直接民主虽然不会完全替代代议制民主机器，但是其所起的补充作用必将上升。工党如今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在对修宪性质的问题进行决策时（比方说，《2000年地方政府法案》有关百分之五的地方选民可以要求对直选产生的市长进行公投以及保留语法学校等提案），工党已经诉诸于全民公投。既然民众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信任来决定与直选市长、语法学校相关的议题，那么或许群众也有能力来决定像地方政府预算、国家医疗体系这样的议题。这其中的危险之处也很明显，即大众参与的民主可能会被巧言令色的政客所绑架。

下一任的英国首相仍将是问题缠身。但他将面对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改革我们的民主制度，从而与我们时代政治参与已经跨越了政党这个现实相符合。

（弗农·波格丹诺是牛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但是他对卡梅伦的一些政策却并不满意。波格丹诺说：“他（卡梅伦）似乎已经忘记了我教给他的一些东西。我很乐意现在再给他在公民自由方面补补课。”）

（本文译者：Huzexi，原载于译言）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8-9 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及其恶果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在西方多党制，一些领域如同性婚姻、堕胎、环保等不时会出现“党争”，造成社会和政治的高度分化。但因为民主机制的存在，“党争”不至于瘫痪政府。中国的情况不同。一旦“党争”波及高层，后果便会不堪设想，搞不好就会瘫痪政府的议程，甚至演变成为权力之争。”

近来，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来的“党争”趋势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抱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在社会层面，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已经有年，只不过是没有对执政党本身造成巨大的影响。或者说，社会层面的“党争”和执政党本身的权力和政策运作是分隔开来的，也就是一种“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局面。但今天，有很多迹象表明，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党争”开始向党内逼近。这不仅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研究机构和智库开始卷入，更重要的是一些政治人物也开始有意识地展示其意识形态上的偏好，给予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机会，试图与权力运作关联起来。

社会层面，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不仅不可避免，更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除了传统没有利益分化的社会和近现代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专制社会，所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会呈现出多元性。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出现“党争”表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已经缺乏了任何妥协的空间，各自原教旨主义化，各方努力把自身道德化，而把对方妖魔化。既然自己是道德的化身，而他者是妖魔的化身，那么自己和他者的关系便是水火不相容，结果便是党同伐异。中国现在就出现这种趋势。各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者拼命占据道德高地，从意识形态、理论到个人品德和生活，给对方扣帽子、怒骂、诅咒，非常类似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各个派系之间的纷争，所缺的只是现在还暂时停留在文攻层面，还没有到达武斗层面。

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至少在社会层面，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分化远超西方多党制国家。例如，西方多党制国家也有左、右派，但左、右派之间在大多数问题上是有很大的共识的，或者说“同”的地方多于“异”的地方，只是一个左一些，另一个右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条道路成为可能。当然，左、右派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是基于

大多数西方国家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一事实。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制约着社会大多数的极端化，避免社会的激进化。但在中国，左、右派之间没有任何共识，双方各说各的，各做各的，没有任何的交叉和交流，激进化和极端化是左右派之间的最大特征。尽管也有人一直在呼吁超越左右，寻求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但从近代到今天，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实际上没有多大的空间。当然，这也和中国的中产阶级非常之小这个社会现实相关。中产阶级很小表明社会极端分化。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的“党争”和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社会冲突甚至是政治冲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拥毛”和“拥邓”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实际上并不新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重大的意识形态上的“党争”，主要是围绕着对毛泽东的评价，出现“拥毛派”和“反毛派”。这次“党争”以 1981 年执政党出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告终。尽管激进的左派和激进的自由派对这个决议有不同的评估，甚至严厉的批评，但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这是一个可接受的妥协。这个文件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身所犯的一些错误区分开来。毛泽东思想被定义为那一代领导人的集体结晶，而毛泽东则是主要贡献者。即使是对毛泽东本人也有公正的评价，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和其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经历了第二次意识形态的“党争”，这次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这次“党争”以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讲话”和随后的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告终。这也是一次妥协，是传统社会主义理想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妥协，所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和前一次一样，激进的左派对之不满，激进的自由派也对之不满，但这种妥协则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和认同。

那么，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再次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近来的“党争”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不同评估。左派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而自由派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左、右派之间的互相否认，导致了两个三十年之间的互相否认。对前后三十年的“党争”进而又导致了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政治人物的“党争”，出现了“拥毛派”、“拥邓派”和与之相对的“反毛派”、“反邓派”。现在，在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这个基本面上的“党争”开始迅速向其他所有重大领域扩展，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宪政与政治改革、国家权力与执政党合法性、市场经济、私有化、政党制度等等领域。

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党争”，如果从经验的视角来看，毫无意义。人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既非左派想象的世界，也非右派想象的世界。很简单，出现“党争”仅仅是因为双方都不敢正视历史和现实的产物。无论是左右派所热衷谈论的价值观、信仰体系、概念理

论，还是他们所向往的社会，所拥戴的政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异常复杂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一个简单的否定或者肯定所能了事的。

当然，对这些简单的道理，左、右派也不是没有认识的。左、右派之间的“党争”背后更有其复杂的因素。这里，既有其社会背景，更有其对现实利益的追求。社会背景主要是中国社会的分化，财富分配的不公，社会正义的缺失。但出现“党争”显然不仅仅是对诸如政治自由、社会正义等价值观、信仰体系的追求。通过表面上的意识形态的“党争”，左、右派实际上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历史上历次“党争”如此，今天也如此。

意识形态多元化不可免

今天的中国，因为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但意识形态领域的原教旨主义化则是必须加以避免的。人们必须对党争的恶果具有深刻的认识。一旦“党争”变得不可遏制，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而执政党本身也不可置身事外。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特定领域的“党争”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波及和影响到其他各个领域。在西方多党制，一些领域如同性婚姻、堕胎、环保等不时会出现“党争”，造成社会和政治的高度分化。但因为民主机制的存在，西方的“党争”不至于瘫痪政府。中国的情况不同。尽管现在的“党争”还没有深入到执政党的高层，但一旦波及高层，后果便会不堪设想，搞不好就会瘫痪政府的议程，甚至演变成为权力之争。中共历史上历次路线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权力交叉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恶性“党争”的产生呢？中国历史上每每“党争”发生，皇帝便是决定因素。因为皇帝可以超越任何特定的利益，最后对“党争”做一个决断。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是政治强人来最后解决“党争”问题。无论是王权时代还是强人政治时代，“党争”的解决往往要不依赖于暴力机器的使用，要不依赖于重新把官方认定的意识形态加于社会之上，或者两者同时使用。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常人政治时代。很显然，没有人会相信现在使用暴力机器可以消除意识形态层面的“党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逃避少数社会群体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党争”，就要从建设新型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入手，也就是说，要做“加法”，或者增量改革。而重建意识形态正是今天执政党最薄弱的地方。

那么多年来，执政党本身在意识形态上可以说一直处于哑口无言的状态，没有任何建树。不仅如此，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完全沦落为只会思想控制，而没有能力进行思想生产。现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至多也就是一些口号的积聚罢了，对此有多少人信呢？不用说在社会群体中了，就连党内能有多少人信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没有人信，那么就是说，这个社会处于意识形态的真空下。而任何社会是需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是凝聚一个社会的软力量。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意识形态。传统数千年，意识形态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准宗教的角色。

鸵鸟政策再也行不通

意识形态上没有建树，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领域的高度不自信。在概念上，人们都知道应当如何“求同存异”，实现“和而不同”式的和谐。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人们一直所做的则是相反的事情，做的不是“求同”，而是“扬异”。实际上，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近代以来数代政治精英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当然，他们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往往因为历史和个人的因素，选择了不同的途径，一些成功了，一些失败了，而失败了之后再去使用新的方法。这些成功和失败的故事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历史都有其自身的延续性。现在人们不去正视历史，而是各取所需，做着互相否决的事情。这种相互否决发生在不同历史的阶段、不同的政治人物、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在普遍互相否定的情况下，要确立一种社会大多数能够接受的意识形态变成一种不可能的使命。这是中国的现实：只有分化社会的少数人的意识形态，而没有整合社会的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只有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没有具有妥协精神的普世主义；边缘社会群体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主体社会则处于边缘状态。

没有思想的自由也是缺乏普世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没有区分，一切过于政治化。社会思想对意识形态当然具有影响，但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思想史表明，当人们对一特定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早期阶段，必然具有很大的争议，但随着思考的深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很大一部分就会具有政策意义，可以为政治所用，转化成为政治和政策共识。在缺失思想自由的情况下，社会没有共识，意识形态也就没有根基。自己没有自由创造和生产思想的机会和能力，只好到外国去搬用，结果使得社会更加分化。

意识形态领域愈演愈烈的“党争”局面说明，执政党已经不能象传统王权或者强人政治那样来管控社会意识形态，而执政党一直所秉持的“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鸵鸟政策也已经显得不可持续。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总有一天，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延伸到政治权力领域，将酿成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刘岩川

设计：潘雯怡，张宇星，季文仪

校订：常仁豪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